

寻求理想家园

——安妮塔·布鲁克纳老年小说中的空间与身份建构

张孟玲 南健翀

【摘要】 寻求理想家园是安妮塔·布鲁克纳三部老年小说主人公的共同诉求。空间成为老年人关注的焦点，与老年人的身份建构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以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观之，第一空间中的入侵、断裂及频繁的切换，造成了老年人的“暗恐/非家幻觉”和身份焦虑；第二空间中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内的权力运作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他们在文化意义上家园的失落和身份的丧失；老年人通过身体反抗、记忆与梦的方式建构与权威话语相抗衡的第三空间，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构，开启了通往理想家园之旅。通过具有多重意蕴的空间书写，布鲁克纳直面社会老龄化困局，对处于不断流动、重组的后现代大都市空间中困顿、挣扎的老年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安妮塔·布鲁克纳；老年小说；理想家园；“第三空间”；身份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3)02-0206-07

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及老年边缘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正如萨拉·哈珀（Sara Harper）所称，老龄化问题如同全球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一样，成为21世纪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① 英国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在二战之后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1948年，英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10.6%，2018年该比例上升至18.3%，人数超过1200万。^② 老龄化给英国的社会经济、劳动力市场、公共财政及社会基础设施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在看重年轻、活力、价值的社会，老年人往往沦为社会中被忽略和排斥的边缘群体。

面对时代巨变和社会困境，英国当代文坛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积极回应时代命题。作家们深入思考英国当下面临的老龄化困局，努力探索文学机制如何解释人类衰老，社会如何养老、敬老，特别是如何构建老年人理想的生存和文化空间，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等社会重点关切。1984年布克奖获得者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

【作者简介】 张孟玲，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南健翀，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曼布克文学的文学生产研究”（17BWW086）；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年度博士重点项目“对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童话小说的解构主义分析和狂欢化诗学特征探究”（BSZD2019006）

① 林万洲：《借鉴英国经验着力解决老龄化问题》，《中国统计》2006年第11期。

②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英国人口估计报告》，<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opulation-andmigration/populationprojections/datasets/table121oldagestructurevariantukpopulationinagegroups>。

1928—2016)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自1997年起,布鲁克纳陆续创作三部以老年人为主人公的小说:《访客》(Visitors, 1997),《下一件大事》(The Next Big Thing (US title: Making Things Better), 2002),《陌生人》(Strangers, 2009)。三部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及好评,《访客》被《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誉为“卓尔不群的当代小说,有古斯塔夫·福楼拜,托马斯·曼及简·奥斯汀等欧洲文学大师之遗风”^①;《下一件大事》进入当年的布克奖长名单;《陌生人》更是力压同时期作家的作品,入围当年的布莱克奖短名单。三部老年小说以不断流动和重组的大都市伦敦为依托,展现了老年人在以碎片化和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空间中建构主体身份的困境。布鲁克纳笔下的老年人大都经济条件较好,无需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均遭受了家园的失落,正如劳特里奇(Mary E. Rutledge)所说,“无家可归”、“逃离”及“主人公对理想家园的追寻”成为贯穿布鲁克纳小说的主线。^②在三部小说中,空间成为老年人关注的焦点。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和虚空的背景,而是承载了老年人的思想情感的表征,与老年人的自我体认和身份建构存在紧密关联。纵观国内外近百篇文章,研究者们多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心理分析、酷儿理论、视觉艺术等视角对小说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却鲜有人从空间角度透视老年人的生存困境,解析空间与老年群体身份建构的关联。

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也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学家关注的焦点。1967年,福柯提出异质的、充满差异的“异托邦”概念,并坦言道:“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③福柯的“异托邦”构想挑战了西方哲学界自19世纪以来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时空观,也标志着当代理论界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提出了超越传统二元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tripartite model of space),即社会空间可以被概括为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④在福柯异质空间理论及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延伸出“第三空间”的概念。索亚认为,“第一空间”主要关注的是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可由经验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思而成,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人类空间性深思熟虑的再表征,第一、二空间与列斐伏尔“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三空间”起源于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⑤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全球化语境中都市空间建构提供了理论性及实践性经验,同时也为文学作品中具有多重空间特征的物质与文化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老年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具有深厚的生活意蕴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都市大规模推翻、重建的空间改造浪潮中,布鲁克纳小说中的老年人不仅面临居住空间的压缩,而且遭受社会文化的规训及权力、资本的压迫,尽管年届高龄,他们依然积极寻求理想家园,并在此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身份重构。本文拟以索亚的“第三空间”为主要理论依托,对布鲁克纳三部代表性老年小说《访客》《下一件大事》及《陌生人》中的老年空间进行观照,从以居住空间为主的第一空间,以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为主的第二空间和以经验和想象为主的第三空间三个层面追溯老年群体追寻理想家园的心路历程,探讨空间与老年人身份建构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空间所体现的文化意义与表征意义,为老年人身份建构和自我救赎开拓更多可能性途径。

一、“非家”之家——第一空间中的入侵、断裂、切换与身份焦虑

索亚认为,“第一空间认识论”最为悠久,曾宰制空间知识达数世纪之久,它认识的对象主要是列斐伏尔所说的可感知的物质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方法来直接把握。而作为人类生命起源的家园,成为人们感知世界和探索空间的原点。“家从起源上起就显示出扎根土地的本质”,因此家园不仅意味着人们居住的房屋,而且包括人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场所或地方。人们所扎根的地方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⑥,既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也是人们情感归属所系之处。

① Anita Brookner, *Visito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8, back cover.

② Mary E. Rutledge, “The Monomythic Journey of the Feminine Hero: in the Novels of Anita Brookner,”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1996, p. 33.

③ 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④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Nicholson-Smith 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p. 38-40.

⑤ E. W. 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⑥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54.

在《访客》中，作为土生土长的伦敦人，梅夫人（Dorothea May）对伦敦形成了强烈的“地方依恋”。^①在过去的数十年，伦敦沦为现代主义的试验场，城市空间成为被改造和摆置的对象。这种用模式化、标准化方案对城市空间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浪潮，对梅夫人生存根基的大地和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将城市建筑变成一座座封闭的、隔断式建筑，割裂了梅夫人对伦敦的归属感及认同感，消解了她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伦敦大都市生活的流动性和多变性给她带来知觉轰炸，改变了她的基本生理过程和认知过程。为此，她不得不取消年轻时的海德公园散步、公车旅行等休闲活动，除非必须，梅夫人几乎整天蜗居在已故丈夫留下的房子中。为接待亲戚硬塞过来的年轻访客而购买床具的商场之行对她来说不亚于一场挑战。由于太长时间没出门，熟悉的街道看起来陌生、异域化，伦敦的商场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描述的“超级空间”^②，商场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似乎把一切空间都塞满了，让梅夫人茫然若失，甚至头晕目眩。这时梅夫人才深切意识到家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她一直呆在那里。家园空间不仅是梅夫人参与城市生活的“容器”，而且是其确认身份的基础。年轻访客的到来无异于空间入侵，让她感到身份焦虑，正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所说，“身份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剥夺去尊严和尊重……”^③ 为避免与房客产生空间矛盾，她将活动范围限制在卧室中，将自己变成了家中的“访客”和“陌生人”。对于梅夫人来说，“家不再是记忆中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而是异化为‘非家’和家的并存、不熟悉和熟悉的并存”。城市空间的变动和居住空间的入侵让梅夫人陷入“暗恐/非家幻觉”（unheimlich）。^④

罗斯莫利·乔治（Rosemary George）在《家园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一书中指出，“家”不仅是生命个体可以扎根的稳定场域，而且具有接纳和排除的功能，是“主体性的一个意识形态界定物”。^⑤ 在《下一件大事》中，赫茨（Julius Herz）在即将退休之时收到了房地产商兼雇主的空间驱逐和解雇通知，年届73岁的他必须在一个月內搬离自己工作并居住了大半生的商店重新寻找住处。“空间具有社会性，它牵扯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扯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⑥ 商店既是赫茨维系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空间，承载了他与父母两代人的家庭生活以及与爱人一波三折的婚姻经历；也是他进行劳动的生产空间，见证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对于赫茨来说，这所充盈了所有过往记忆的房子是他“主体性的一个意识形态界定物”，是其身份的见证，“这个房子就是生活的现实，是他的人生”^⑦，搬离这所房屋犹如斩断自己的根茎。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个体化的人类犹如植物一样，已经被连根拔起，他们被迫‘脱离’在旧制度下发芽、生长的土壤”。^⑧ 赫茨突然被从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抛向一个充满未知的、不断流动的陌生空间。空间的断裂瓦解了赫茨赖以建立身份的物质基础，让他陷入“无根”的困境和身份的危机。赫茨的新住处位于奇尔屯街道一座狭窄的建筑的二层，楼下被年轻女邻居苏菲所开的音响店所占领。这所房子不仅空间局促，除了一张床和两把椅子外再容不下其他家具，而且不断被楼下的噪声所侵入。悬置二楼的房子成为赫茨悬置身份的象征，空间的逼仄和异质力量的入侵揭示了赫茨身份重建的困境。

相对稳定的地方与家园固然能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和认同感，但也会带来压迫和禁锢，成为伤害本来就脆弱的主体的空间。家依赖于物理意义上的“房子”为核心建构起来，但同时又以“心”的舒适为根本判断标准，似乎与物理意义上的房子并无关联。^⑨ 布鲁克纳揭示了当“家”从房屋中缺失时，实际的房屋并不能保证安全和归属感。《陌生人》中斯特吉斯（Paul Sturgis）退休时为自己买下了伦敦一座名为“新月”的别墅，他一直未婚，经济优渥，常年在巴黎、威尼斯等度假胜地过着蜻蜓点水式的生活。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新月别墅内装修豪华，设施便利，他却无法安然自在地享受家中的舒适。在房中他感到空间的压迫和禁锢，四面封闭的围墙让他坐立不安，迫不及待逃向外面的空间。但是当他远离自己的家园，流连于异国他乡的风景，又被一种遏制不住的“思乡（家）

①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p. 93.

②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95—496页。

③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6页。

④ 童明：《暗恐/非家幻觉》，《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⑤ Rosemar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

⑥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⑦ Anita Brookner, *Making Things Bet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3, p. 61.

⑧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⑨ 邓天中：《当代英语小说中老年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homesickness) ”病症所困扰,这种思念“不仅指的是一种熟悉的环境,而且指他的生活赖以构建的基础”。^① 现代化科技手段武装起来的家极尽物质的奢侈和便利,却掏空了家的核心内容: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联和情感滋养。缺乏家人的家园之于斯特吉斯不过是短暂的避难所。萨特指出,每个人必须拥有创造自己存在意义的自由,即每个主体都应当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精心安排自己生命的各个部分,以建立一种“地方感”和在世的目的。可是人的自由也带来了一种普遍的不适感,从而导致了存在的焦虑。^② 频繁的空间切换和来去无牵挂的自由让斯特吉斯无法建立一种稳定的“地方感”,确认自己在世的目的,导致他虽然居有定所却无法做到心在“此处”,总是游离在虚无缥缈的“别处”。

空间并非凝固不变的、空洞的容器,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③ 布鲁克纳三部小说中老年人居住的家园遭到了外来入侵,突然的断裂或频繁的空间切换,导致他们的家园建构远离这个空间的真正内涵,沦为“非家”的空间,使他们遭受存在的焦虑和身份建构的危机。

二、失家之殇——第二空间中的错置与身份丧失

索亚所称的“第二空间”具有观念性、建构性和精神性等特点,表征意识形态或乌托邦,它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通常是哲学家、艺术家和个性化的建筑家一展身手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倾情展开论辩的场域。^④

布鲁克纳在小说中书写了老年人在“第二空间”中所遭受的错置或误置。所谓的“错置”,是指“个体无法调和其存在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认知危机”,“错置所产生的环境可以是社会、经济、地理、文化或性别方面的。在错置的环境中,主人公经历排斥、异化、反叛、拒绝或自我强加的流放。”^⑤ 美国当代文学老年学研究专家古列特(Margaret M. Gullette)指出,当代青春膜拜文化催着人们迅速地老去,“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年龄意识形态是我们对整个规范系统的缩略表达”。^⑥ 在《下一件大事》中,布鲁克纳借主人公赫茨之口对这种统治性的文化权威进行指控,“并非所有老年人都会遇到那种停滞状态。……这是一种统治性的文化,一种对老年人的现实欲望完全忽视的默许机制。”^⑦ 由于现代医学、营养技术的进步,老年人完全可以活到一百岁甚至更长,然而文化携带着其固有的歧视与权威,将至少四十年的人生岁月,简化为“衰老”和“停滞”。《陌生人》中斯特吉斯坦言,“不出意外地,老年人会慢慢滑入这个年龄,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期待,自己却无能为力。”^⑧ 足见社会文化的偏见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威胁,以及老年人灵魂无所归依的苦闷。斯特吉斯像生活在艾略特“荒原”中的人物,没有亲人、朋友,被错置在一个碎片化的,陌生、疏离的世界。小说中反复书写的黑暗的街道、呆滞的枯树以及紧闭的窗扉都暗示了老年人无法融入社区,被主流群体排斥的苦闷和压抑。斯特吉斯既失却了第一空间的物质家园,也在第二空间的文化家园中无立足之地,自我和主体感丧失殆尽。

老年人不仅是文化空间中被错置的客体,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过程中被均质化的边缘。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关系重要的一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再生产为取向,发动了均质化(homogeneity)的逻辑与重复策略(strategy of repetitive)。这种形式的与量化的抽象空间,否定了源自自然与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⑨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价值逻辑,老年人身体日渐衰弱,无法为生产体制继续卖命,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首先选择形塑的边缘空间。正如布鲁克纳在《陌生人》小说扉页中引

①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0, p. 78.

② 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3页。

③ Phillip E. Wegner,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 in Julian Wolfreys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5, p. 235.

④ 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 Gisele Marie Baxter, “Narrative Methods and Social Contexts in the Novel of Dislocation,” Ph. D. Thesis, Dalhousie University, 1990, p. 1.

⑥ 邓天中:《面对衰老 文学何为——文学老年学与衰老创痛》,《南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⑦ Anita Brookner, *Making Things Better*, pp. 162-163.

⑧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p. 10.

⑨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51—52页。

用的弗洛伊德之言，“尽管英国有辉煌的历史，但它是富裕和健康的人的国度。而且他们也不应该太老。”^①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恶化和老年群体医疗保健费用的急剧增加，政府不得不出台改革政策，应对财政方面收不抵支、入不敷出的困境，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改革最为出名。撒切尔政府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金支付额度，将养老责任向私人部门及个人转移；另一方面提出“购买权”（Right to buy）政策，大力削减公租房的支出，鼓励全民参与私人房屋买卖和出租。“购买权”政策名义上促进了集体民主，实质上剥夺了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住房权利。大批老年人被赶出公租房，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状态。布鲁克纳三部小说从老年人的个体经历展示了政府、房地产商、城市设计师为实现经济集权，合力对老年居民进行的空间驱逐和总体再编码。《下一件大事》中，房地产商奥斯特洛夫斯基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房地产投资和空间改造，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老年人赫茨，却无权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在房地产商的空间驱逐中仓皇离家。小说对居住地点的命名影射了双方权力地位的悬殊。奥斯特洛夫斯基居住在山顶路（Hilltop Road），而赫茨租住在埃奇韦尔（Edgware）及被迫迁居的新住址奇尔屯街道（Chiltern Street），暗示两者中一个处于权力的顶点（hilltop）和中心，一个处于社会边缘（edge）和受冷落（chill）的地位。权力执掌者总是蠢蠢欲动把自己想象的地理表征为真实的地理，在现实中进行限定和安排。《访客》中，部分老年人受房产经纪人哄骗将自己的房子置换成较小的老年公寓。布鲁克纳戳穿了背后的阴谋，“那些意图估量老年人的财产的人有可能在酝酿一个交易，用一种尽可能机会主义的方式让自己获得一份让人愉悦的财产而不用经历常规麻烦的手续。”^② 知识、权力与技术达成共谋，耍着常见的诱人把戏，对老年人的生存空间进行规划和重组。《陌生人》中斯特吉斯听信设计师的鼓吹，“新月别墅带有高贵的气质，仿佛它是高尔斯沃西或柯南道尔中的宅子”^③，是一个带着完美家庭生活所有益处的地方，于是迫不及待地卖掉父母的旧屋。布鲁克纳有意将藏匿于社会角落的老年居住区与城市外表的规划和建设进行对照性书写，通过地理景观的对比揭示了中心权力对社会边缘空间（老年人）的征服和整合。

“地理空间按照不同的方式分类，而这些方式象征着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有序的地理空间，对什么事情应该发生在什么地方做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判断。”^④ 社会将老年人驱出原来的空间，取而代之的“老年之家”，实质上是对老年人身体进行圈禁和规训的场域，充斥着性别压迫和文化霸权话语。福柯在考察边沁18世纪“全景敞视监狱”时指出，“全景敞视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⑤ 在现代社会，“全景敞视主义”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访客》中梅夫人时常感觉自己像家中囚徒，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社会及丈夫的凝视。即使在丈夫去世后，她也穿着他生前认为女性应当穿的衣服，扮演他者眼中优雅、得体的老年女性角色。衣饰在梅夫人的身上形成了福柯所说的“规训的机构”或“社会法规控制身体赖以凭借的工具”。^⑥ 梅夫人不能为自己的形象定位，必须通过他者的肯定才能获得。她的身体被社会外界及不在场的丈夫所掌控，身体掌控权的丧失隐喻梅夫人身份的丧失。空间成为权力对身体实施规训与惩罚的有效工具。赫茨在奇尔屯街道二楼的新住宅契合了福柯所谓的“全景敞视监狱”，成为社会监视和规训老年人的空间介质。社会剥夺了老年人张扬身体、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赫茨出于爱意去抚摸女邻居苏菲的行为导致了来自社会权力的惩罚。女邻居认为受到了赫茨的猥亵并声称将其告上法庭，她的指控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压力对赫茨进行了精神阉割。正如福柯所言，身体会卷入政治领域，权力关系会“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⑦ 赫茨感到“欲望突然从身体上消失”^⑧，“自己被世界重新定义了男性身份，更像一个宫廷的太监或仆人。”^⑨ 老年人被迫扮演了一种无性别的角色，这种性别不分的状态导致了他们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丧失。

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并非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处于一种二元解读模式之中。尽管在单纯的建筑学等领域，“第一空间”理论可能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往往是“第二空间”对“第一空间”的控制，也就

①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preface.

② Anita Brookner, *Visitors*, p. 179.

③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p. 8.

④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⑤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

⑥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25.

⑦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7页。

⑧ Anita Brookner, *Making Things Better*, p. 160.

⑨ Anita Brookner, *Making Things Better*, p. 140.

是说,想象的空间在控制着具象的空间。理论层面上“第二空间”所具有的控制力,其实只是现实层面上统治性社会关系的霸权性的一种体现。^① 社会文化对老年人的偏见、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逻辑的霸权话语,合力对老年人进行空间征服和整合,而社会提供的“老年人之家”,实质上是对老年人实施均质化规训的场域,导致了老年人文化身份、性别角色的丧失。

三、理想之家——第三空间的建构与身份重构

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既把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都包括在内,又不停留在把这两种空间简单混合起来的层面上,而是明确地指出它是在亦此亦彼的层面上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在《第三空间》一书中,索亚特别涉及到种族、阶级、性别等批判的诸多激进立场,“第三空间”并不意味着有什么舍我其谁的特权,反之,它将呈现一种邀请姿态,打开一个极为开放的空间,一个批评交流的场地,“一个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② 通过“第三空间”,索亚建构了一种反抗统治秩序、包容差异性的空间。

面对空间入侵和文化身份丧失,《访客》中梅夫人意识到,“那些生存下来并且变老的人处在一个找不到方向的国度”,“对他们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被接受和被击败之间找到一条中间的路线。”^③ 与同时期的作家强调社区成员团结互助相比,布鲁克纳更看重老年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鼓励老年人由衰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建构的主体,在《陌生人》中,布鲁克纳借斯特吉斯之口言明,“你不能依赖陌生人帮你走出困境……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需求是完全冷漠的。”^④ 布鲁克纳小说中的老年人通过身体反抗、记忆与梦来完成第三空间的建构和自我身份的重构。

索亚认为,作为空间性存在者,人首先应被理解为空间的生产者,而构成空间生产出发点的正是人的身体。^⑤ 作为空间主体的身体规定着空间,空间因此而成为人类主体建构的基地。当空间对个体造成圈禁时,身体会抗拒压迫性关系的再生产,对压迫性的空间进行突破和重构,建构与现实空间形成对抗机制的新空间。因此,面对社会的圈禁和规训,老年人首先选择了身体反抗。《访客》中梅夫人意识到自己的一生被社会规则、惯例及行为规范所束缚,决定不再屈从于社会强加给老年人的空间归属。她脱下丈夫生前为她选择的长裙,换上自己喜欢的服饰。服饰溢出了常规的遮体避寒本初功能,成为老年人追求空间自由的表达方式。新的服饰象征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产生,表明梅夫人已将自己的生活纳入一种新的生存理念和道德秩序中。《下一件大事》中赫茨则通过性来表达自己的不甘衰老、不甘死亡的抗争态度。年轻女邻居苏菲曾让他重燃男性的热情和渴望。笃信弗洛伊德的赫茨始终认为爱、性爱是一个人的生命动力的主要来源,爱不应该只限定在年轻人和青春期岁月。在表露爱意遭到苏菲指控后,赫茨仍然渴望来自异性的爱情。绝望之时他收到青年时期女友的来信,毅然决定移居瑞士奔向爱的家园。

由于身体的衰老和活动能力的退化,很多老年人不能进行空间的移位来完成自我空间的重组,通常他们会借助记忆、梦等方式重构自己的身份。记忆与梦是每个人特有的时空定位、价值观念及情感诉求的反映,也是老年人抵抗均质化权力,恢复个人主体性的基础。

“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⑥ 《陌生人》中斯特吉斯一直为童年时期家庭隐秘的创伤所困扰。在新月别墅中,他回忆起幼年时期的旧居,阴暗的楼梯、昏暗的卧室、父母忧愁的面容以及统治整个房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成为“代际间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的具象表征,萦绕他的心头。“代际间幽灵是典型的内并创伤。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灵空间中重复表演,形成作为创伤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⑦ 作为纳粹屠犹逃难者,父母将战争及流离失所的创伤以无意识形式植入斯特吉斯的无意识之中,导致后者一生都被一种难以言明的“无家可归感”所困扰。在回忆往事时,斯特吉斯吃惊地发现自己的重要性。法国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① 唐正东:《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一种批判性的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② 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

③ Anita Brookner, *Visitors*, p. 234.

④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p. 164.

⑤ E. W. 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⑥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⑦ 陶家俊:《创伤》,金莉、李铁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Bachelard)曾强调“家宅”对人类保存记忆的特殊作用。“家宅”这一特殊的空间对于固化时间和记忆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故居正如他的情感地图,在其中,回忆所具有的藏身之处:地窖、阁楼、角落、走廊,每一个橱柜,每一扇门,以及他曾经睡过的最舒心的床……都被很好地刻画出来。“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①斯特吉斯意识到,正是儿童时期的家宅庇佑了他的梦想,让他能够在安详中做梦。通过对故居的回忆,斯特吉斯辨认出过去的自己,还原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与过去达成和解,走出代际创伤的阴影。

梦是感知空间与认知空间的居中调停者。在《访客》中,梅夫人渴望寻找一个理想的空间,能够舒适自在地生活,她频繁梦见一所海边的房子。这所房子契合了索亚所说的“第三空间”,为梅夫人对抗现实空间提供了调停和协商之地。它是梅夫人年轻时在旅途中见过的真实存在的地方,同时又因为其携带了梅夫人的期望和遐想而具有一定的想象性。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是被禁锢欲望的变相满足。梅夫人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在梦中得到了伸展。海边的房子象征了梅夫人想追求却没有实现的理想家园。“梦实质上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一种叙事行为。与意识中的叙事一样,梦中的叙事也是一种为了抗拒遗忘,追寻失去的时间,并确认自己的身份、证知自己存在的行为。”^②在梦中家园,梅夫人坦然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穿着自己喜欢的服饰,赤足站在屋外享受海风的吹拂。梦中放飞的自我与现实中的得体、拘谨的梅夫人形成鲜明对比,却是梅夫人真正想成为的老年女性的样子。通过梦中家园,梅夫人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证知了自己的存在。这个梦不断为她注入新的生命能量,促使她行动起来,追寻生命最后一道光束。与此类似,《陌生人》中斯特吉斯无法忍受伦敦的异己之地,迫切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空间。他开始反复梦见一个“完美的旅馆”,这个梦中旅馆是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超验穿越之家”,它没有形状、颜色、具体地点,却是他生命与灵魂的归宿。它既不同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又打破了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对立,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对抗,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像博尔赫斯同名小说中包罗万象的“阿莱夫(The Aleph)”。 “完美的旅馆”与现实中的呆滞、压抑的空间形成抗衡,让斯特吉斯得以从严酷的空间斗争中喘息,并激励他行动起来,开启到向往的家园之旅。

通过身体反抗、回忆和梦,布鲁克纳三部小说中的老年人建构了超越具体地理、历史的,与统治话语相抗衡的第三空间,从而克服了“暗恐/非家幻觉”,开启了通往理想之家的旅程,也在此过程中重塑了自己的身份,恢复了自我的主体意识。

四、结论

通过对“第三空间”理论的阐述,索亚希望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和第三空间边缘的位置,以期建立包容更多“他者”的、充满差异的空间,这也是他的“第三空间”理论较之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更具有广阔性和包容性的地方。^③在此理论观照下,布鲁克纳小说中的老年空间呈现出多维的属性,也参与到老年人追寻理想家园的心路历程及身份的解构、重构过程。第一空间中的入侵、断裂及频繁的切换,造成了老年人的“暗恐/非家幻觉”和身份焦虑;第二空间中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内的权力运作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他们在文化意义上家园的失落和身份的丧失;老年人通过身体反抗、记忆与梦的方式建构与权威话语相抗衡的第三空间,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回归。

老年关怀能否在文学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表达无疑是文学良知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布鲁克纳勇挑作家的责任担当和时代使命,直面英国社会老龄化的困境,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和真实、自然的文风,照亮了学界普遍忽视的老年空间,给予边缘空间的老年人以发声的权利。正如她在《陌生人》扉页的手记中所述:“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或像他们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真实地存在着。”^④在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当今时代,研究布鲁克纳老年小说中的空间表征和身份建构,具有深远的现实启发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

(责任编辑:潘纯琳)

①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②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6页。

③ 郑佰青:《西方文论关键词:空间》,《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

④ Anita Brookner, *Strangers*, preface.